

淮海路上爱司公寓底层还是大方布店的时候,店门外有个交通岗亭。我一直对这个岗亭有个人化的念想。后来才知道,这个岗亭,也是上海很重要的集体记忆。

中国第一座红绿灯,就是在淮海中路瑞金路十字路口亮起来的。

已经是一百多年前的往事了。

1919年8月26日据报道,上海霞飞路和圣母院路(瑞金一路)、金神父路(瑞金二路),出现了上海第一座红绿灯。

显然,这个路口是当年上海最繁华的地段,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。繁华需要有繁华的指数,碰撞需要有预防碰撞的措施。这个历史性指数和预防性措施,选择了红绿灯。

据1924年出版的陈伯熙《上海轶事大观》记载,在有红绿灯以前,公董局雇佣人员站在交叉路口中间,手持一块木牌;木牌一面涂白漆,一面涂红漆。遇两条马路两车同至,视情举白面牌表示放行,举红面牌表示停车,依次放行。白面牌就是后来的绿灯行,红面牌就是后来的红灯停。

有了红绿灯,就需要有操作红绿灯的人。在红绿灯之下的十字路口,站着一个警察,拿一个线控的键盘指挥过往交会的汽车,像现在玩游戏一样。

城市交通的秩序,有了红绿灯,才法律化地确定下来。红绿灯是上海秩序的象征,并且渗透到了上海人的做派中去。

有个很是普遍的说法,上海人富有契约精神。在我看来,红绿灯恰是隐喻了上海的契约精神。“红灯停,绿灯行”,是个体服从与社会保护的契约关系。每个人在服从红绿灯的同时,也在受着红绿灯的保护。社会化契约不只是规定了个体的义务,也规定了社会的责任;只要个体尽了自己的义务,社会就有责任保护个

第一座红绿灯的隐喻

马尚龙

体的利益。个体义务和社会责任,是由红绿灯来体现双向信任的。

在城市里,每个人和生活方方面面发生的关系,都隐含了红绿灯的意义,也是契约的意味。是与非,荣与辱,倡与禁,彼此间行为处事有规可循,有界可依,何尝不是一座座红绿灯在发生作用?当然,闯红灯也一定常常发生,就需要红绿灯的“键盘手”出手了。

虽然中国的第一座红绿灯是在上海亮起来的,而且在中国红绿灯最多的城市也一直是上海,但是直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上海的红绿灯并不普及。即使是在淮海中路,从西藏南路到常熟路,也只有六七七个十字路口蒙受红绿灯的宠幸。也只有这六七七个十字路口,是有公交车交会的。

有了红绿灯,后来也就有了岗亭。最早的岗亭是在十字路口中央,后来才搬到了街角。红绿灯稀少,岗亭就是马路的一道布景,而且也是“沉浸式”活动的道具。

从我有记忆开始,淮海路瑞金路口的岗亭,一直立在瑞金大楼(爱司公寓)门口。有过一张淮海路上“红领巾给警察叔叔送茶水”照片,就发生在这个岗亭。还看到马路对

面的马兰花童装店。如今一看便知道照片是摆拍的,但是在当年,照片中的两个红领巾让很多小学生心生羡慕。很多年后会发生,照片传递了两个信息至今还有价值。一是附近的中学小学加起来有近十所,学生实在多,选择这个岗亭有典型意义;二是可以轮到去送茶水擦玻璃窗的都是好学生;学生要学好,作为公序良俗总归没错。

当年很多交警岗亭,都有红领巾送茶水擦玻璃窗的照片,只是对于我,淮海路瑞金路街角的岗亭多了亲切感。我住在淮海路,读的小学也在淮海路



夜光杯

春花四帖

钱红莉

杏花
小区有杏树四五株。每一年春汛,都是杏花带来的。蓓蕾深红,花

气稍退了些,且杂糅些枯草的清甜气息……人于李花下徘徊久些,有晚霞盈窗的悸动。

十九点整,小区广场舞应声而起,我一边沐浴着李花的香气,一边听郑绪岚《牧羊曲》,哆哆的,糯糯的,溪流潺潺的,有昔日重来的恍然,是三十年的光阴岁月吧——清朝一不知名诗人写:采薇南山下,忽忆千里人。迷惘而惆怅,就是这么个意思。

李花花朵小而细,密而繁,大风也吹不散它们,可赏十余日。每日上午,在厨房洗菜,偶一抬头,窗外李花如瀑,叫人迷离,不禁有正青春的错觉,一颗心,仿佛可以飞。

早晨,伫立露台,俯瞰楼前那几株李树,却是沉静孤弱,群鸟花丛间翻飞鸣唱,一日里最珍贵的煮微时鸣。

韩愈写:李花初发君始病,我往看君花转盛。这是寒食节了,借花起意,深情,忧伤,无奈。

橡木花
春天远足,去访山。行至半山腰,有一山谷横亘,迎面一群橡木,叹为观止。首次得见如此规

李花是最平凡的花。李树有两种,一种先花后叶,另一种花叶齐发。我喜欢前者,满树繁花细朵,浅粉而白,一派雪意。

我家楼前屋后一共十几株李树,皆为先花后叶品种。今年的李花,同样是一夜爆开的。

白天,李花的香气似被阳光压下去了。黄昏里的李花,香气沾衣而不绝。吃罢晚餐,我喜欢

上,经常经过这个岗亭。第一次看到这张照片,我还是小学生,梦想有一天也拎着钢种茶壶,为警察叔叔送茶水一杯。后来回想起来,我更想承担的角色是擦玻璃窗,那就可以看到警察是如何扳红绿灯的了,假如还可以把手伸进去扳一下,做一次键盘手……可惜这梦想始终没有实现。

后来红绿灯不需要手动操控了,岗亭也就因多余而被拆除了。我看到过还有警察岗亭的瑞金大楼照片,那时候街面商店还是大方布店。那时候没什么人知道这幢老房子是鄂达克设计的,也没有什么人知道这个十字路口红绿灯的历史地位。

组。在表演组里,还分主持组(写主持词、训练学生司仪)、节目组、剧务组、音响组、摄影组;在比赛组里有挥春组(包括硬笔组、毛笔组)、班级布置组、礼篮设计组;至于奖品组,则要对应所有的比赛,购买一二三优胜,四种奖品,奖状上还得写上班级和名字。由于所有比赛成绩都在当天揭晓,

校园里的“春晚”

宣轩

所有获奖作品都要在颁奖时呈现在礼堂的大幕布上,那工作的紧张程度,可想而知。

最令人头疼的是班级布置比赛和礼篮设计比赛。因为每个班级都必须参加,那就难倒了中一(初一)的班级。学生们初来乍到,显得非常安静和被动,家长也不放心孩子放学后留在学校做事,不甘落后的班主任们往往就亲自上场,起早摸黑,打扮教室和礼篮,为班级争取荣誉。要知道,中一的班主任们开学之后不仅要核对对学生姓名、家长手机号码、学生健康状况、饮食过敏记录,还要选举班干部,参加迎新住校露营,更要帮助新生熟悉校园、了解校规等,非常繁琐和辛苦。

五里中学

正凯

五里中学,是我的母校。我在那里两年寒窗读完了高中。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,处在“文革”后期的教育工作秩序逐步恢复,这才有了五里中学二年制的高中班招生。经过考试、政审,我被录取,编在恢复招生后首届高中(一)班。

五里中学坐落在五里老街西首,绿树环绕一片青色砖瓦窗几明亮的校舍。徜徉校园的两年里,给我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。开学伊始,学校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。我们班羊姓同学代表新生讲话,与会全校师生神情严肃,

此外,开学以后,学校春节期间的喜庆气氛也属于新年活动的一环,所以,也是我的工作范畴。我必须请校工帮忙,挂灯笼,贴对联,送福字,让学校变得喜气洋洋、红红火火,甚至学校大门前的两副对联,也要年年更换,年年新。至于活动当天,嘉宾迎来送往的细节也是马虎不得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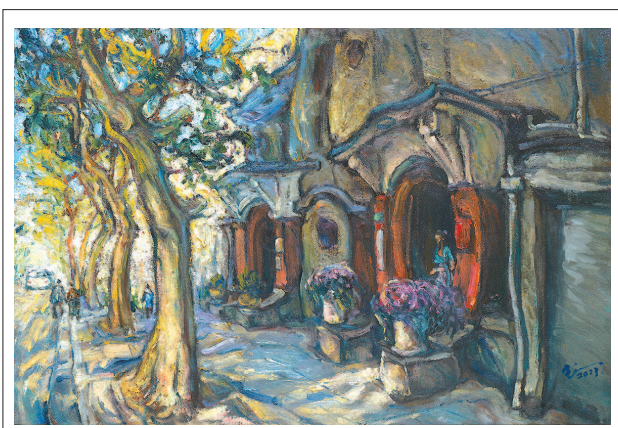
为了增加喜庆效果,我还自找麻烦,邀请了校外舞狮舞龙队来学校助兴,赢得了师生的欢喜;为了使每年的庆祝活动玩出新意,我还成立了创意组,自己担任组长,要求自己每年搞一个新节目。有一年,我收集了家在国外的师生名单,千方百计与他们的家人取得联系,悄悄制成了《来自远方的祝福》视频。视频结束,全场不仅鼓掌声阵阵,更有抽泣声连连。

现在想来,为了开学之后的迎春活动,我当“导演”的十年,不仅忙得脚不点地,也使全校师生都忙碌不堪。但他们身上的红衣、手上的柑橘、脸上的笑意,仿佛都告诉我,他们乐在其中。

十日谈

开学以后

责编:殷健灵



阳光下的延庆路(油画) 夏书亮

花,如参天星斗,看得久了,又如流光激滟,直叫人心头荡漾——彼时,若有山鸟衔云而来,直如仙境了。

下山,已是黄昏,渐行渐远的山谷淡黄一片,极似月光的韵。千万株擦木的花朵,正值花期,将一座原本平凡的山装扮得诗性盎然。人从自然中回到城市,山野的清气几日不散。

油菜花
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一个春天,去上海,坐绿皮火车,过马鞍山,至金陵,徐徐穿行于苏南大地,看

尽无数油菜花。渐渐地,上海地境到了,大片油菜花依然不绝——我才知道,纸醉金迷的上海,也有乡下啊。

我如今寄居的城市地处江淮平原,周边虽有大量油菜地,但,到底没有皖南的壮美辽阔。

每年这个时节,人的味蕾会敏锐地捕捉到地气萌动,自会呼应张志和的一句诗:“西塞山前白

鹭飞,桃花流水鳜鱼肥。”就一直想往皖南走,车行于大片油菜花田,累了,随便歇息于某个村落,找一爿小食店,点一条红烧鳊鱼,一盘炒水芹,一瓦钵火腿河蚌汤,足矣。饭罢,继续赶路,无从明确目的地,往皖南深处即可……

我的故乡盛产油菜籽。有一年载父母回乡做清明,站在荒凉的山冈,俯瞰圩田满目金黄,望得久了,直想痛哭。近在咫尺的圩田,仿佛升起浩渺歌声。花气汹涌,一路铺展至遥远的地平线,无有尽头,直如大河滔滔,亦如飞流直下,声震屋瓦——是造物端坐天庭,赐予人间的黄金。而我,便是张志和诗中那一个“浮云万里烟波客”。

油菜花田间,总站有一株桃树。桃花开在乡间,自带清气、仙气,好比这世界这么多人,唯独它那么安静。

油菜花,开到盛时,仿佛有隆隆兵气。一个有故乡的人,注定也是解甲归田的人。

思敏捷,能融会贯通;有的写一手好字,笔锋秀丽。我则相形见绌,差距较大。为此,我从高一第二学期开始,课余时间抄写《成语词典》以习文练字。临近毕业,一本辞典抄完了,但自感写字长进不大。

难忘师恩。一批学历高、教学能力强的老师因各种原因集聚于穷乡僻壤的五里中学,这是我们的幸运。武老师的语文课犹如行云流水,表述清晰。至今难忘一次晚自习时,他来教室叫我到办公室,耐心地指出我作文中存在的问题。教数学的陈老师逻辑分析透彻,易于接受。复旦大学毕业的工老师每次上英语课,都能让我们领略到他的学识造诣和儒雅随和。身材不高的郑老师在讲台上嗓音洪亮,把物理化学原理讲得头头是道。还有大学历史专业的常老师多才多艺,组织学生在校外时间排演京剧样板戏。读过私塾的周老师以工老师的蝇头小楷为我们填写毕业证书。

两年里,我们还“兼学别样”,去生产队帮助夏种,赤足田埂,插秧送肥;参加公社的水利建设,寒风中挥锹抬土;历时一周去工厂车间,在机器轰鸣声中潜心理学工。弱冠之年,青涩的我们也会有逾规之举。晚自习时集体逃课,步行几里路露天观看电影芭蕾舞剧《白毛女》。我当时边看边想,这是个什么样的学校,怎么能演绎如此恢宏的佳品,以致现在每次路过上海舞蹈学校门口,我都会致以注目礼。

两年高中的日子里,我们住校的同学在每天碗筷声中,在二十多人上下铺的寝室内,在朗朗书声的教室里,建立了纯真的学友情谊。类似“同桌的你”的故事,那时的我们没有可能。我们深知,在生活清苦的读书声中伴随着父母家人的节衣缩食,凝聚着老师们的挚爱与奉献。由此,也练就我们勤奋刻苦、坚毅的秉性。

我忘不了五里中学,这是我的成长地、出发地。

在新加坡,我当了20多年的中学老师,每年元旦过后,就是新学年的开始,将面对新的学生新的教学任务,心情应该是很平静的。但,我却总无法轻松,因为每年我都要负责学校新年庆祝活动,要调动全校千余名师生共同参与。

不知为什么,自从我到了这所学校,校长就把学校的迎新年和庆中秋的任务交给了我,一连十年。

这十年里,大多数的春节都在二月,而有些春节是在一月。一月的春节,令我手忙脚乱。因为开学以后,我就要把新年庆祝活动的方案交给校长审核,再发给全校师生。而校长审核活动方案的时间不会少于一周。那么,留给我准备庆祝活动的时间就更短了。

除夕那天,学校停课庆祝春节,所有活动由我策划和落实。

全校的庆祝活动分成两个部分,先是一小时班级活动,然后是一个半小时礼堂集合。为此,我把负责庆祝活动的老师分成相应的两大组。班级活动比较简单,一般由视频和游戏组成,班主任老师可以通过事先录好的视频,在班里与同学们互动。而礼堂庆祝就复杂多了,像极了央视的春晚。我把礼堂庆祝分成了表演组、比赛组、奖品

